

齐 家 文 化 研 究 (下)

张 忠 培

(吉林大学中国北方考古研究室)

五 分 期 与 源 流

(一) 对齐家文化的源流的研究,有赖于对它分期的正确认识。讨论齐家文化分期的基础,是迄今考古工作积累起来的有关资料。除前面分析过的几批资料外,还有将在后文提及的一些零星资料。它们基本上出于墓葬,遗址出土的很少。这自然将影响我们对齐家文化的面貌及分期的认识。同时,正如前面已指出的,齐家文化的分期与其遗址及墓地的分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课题。遗址及墓地的分段和文化的分期,虽都是确认当时文化进程中的临界域,但其间是存在区别的。

第一,属于一考古文化的某一村落或墓地,只是这一文化所属的某一人们共同体的遗存。任何一考古文化总有这样的若干个人们共同体而占着相当广泛的地理范围。它们在共同具有某些文化要素的情况下,也往往存在着一些地域性的差别。对一遗址或墓地的遗存的分段,不存在地域性差别问题,而探讨一考古文化的分期,虽主要着眼于它的共同文化要素外,也往往要顾及这一文化的地域性差别。

第二,一遗址或墓地的起迄年代,往往只是它所属的考古文化存续年代内的一部分时间。前面讨论的四处墓地的起迄年代,都只是目前公认的齐家文化存续期间的部分时间。因此,只有在归纳、提炼对它们分段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并把它们联结起来,才能产生齐家文化分期的认识。

第三,对文化进程的认识也存在区别。这一般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 准确认识的程度,例如,在只分析秦魏家南墓地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忽视随葬 III 式双大耳罐 M 82 和其地的四段墓葬之间存在实际区别,将它归入四段,又如不把秦魏家两片墓地联系起来考察的话,很可能会将 M135 归入南墓地五段,可见,只从一遗址或墓地遗存分段,而不着眼于文化分期的考察,将影响认识的准确程度;(2) 在反映文化进程之临界域的认识方面也将存在着区别。这可从将要讨论的文化分期和前述诸遗存的段别之间的区别得到说明,现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从表面上看,文化分期似乎显得粗一些,分段似乎显得细一些,但从实质上观察,分期比起分段,更能准确地认识文化进程的临界域,也就是更能抓住文化演变过程中的质的差别。

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2 期

(二) 现在,让我们直接讨论齐家文化的分期。

从前几节所述墓葬段别已看出,皇娘娘台的三段、大何庄三段、秦魏家南墓地五段和秦魏家北墓地二段,均基本上缺乏标志本段的特征性器物。具有类型特征的器物是考古文化分期的标尺。上述那些段别对估定某些墓葬的年代虽有其必要性,对考古文化分期却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在讨论齐家文化分期时,自然可以不顾及这些“过渡性”的段别。

秦魏家遗存的年代跨度较大,内涵和大何庄及皇娘娘台有一定的联系。通过对它的分析,将为探讨齐家文化的分期找到契机。

秦魏家南北两片墓地的墓葬均被分为三段。其中南墓地的五段及北墓地的二段,都是不必顾及的“过渡性”段别。这两段墓葬出土的器物,可按其情况分别处理如下。

1. 凡是其前后段别的标准器物,自当归入相应的段别。

2. 凡墓地内仅见于一座墓,对分期无意义的器物,应随同原段别剔出陶器比较表。

3. 将本段自有的,且至少两次见于不同墓葬,有分期意义的器物,据“过渡性”遗存的年代可能晚到其后一段的情况,均分别计入南墓地六段或北墓地的三段。

同时,从北墓地一、三段及南墓地四、六段剔除那些只在墓地见过一次的,或早晚诸段互见的,无分期意义的器物。这样,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四段墓葬出土器物统计表可以看出,两片墓地各两段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别,北墓地前一段和南墓地后一段区别更大,而北墓地后一段与南墓地前一段却基本相同。后者共出 III 式盆、V 式单耳罐、III 及 IV 式侈口罐、II 式长颈罐、I 式单小耳罐、IV 式双大耳罐和 III 式高领双耳罐,表明它们的年代相近,可以合并为一段。它和南墓地后一段出土的双大耳罐及高领双耳罐的形态判然有别,却和北墓地的前一段共出 III 式高领双耳罐,显示出三者之间在年代上的亲疏关系。

秦魏家南墓地三段,即以“三层”八座墓葬为代表的遗存,出土的绝大多数器物的式别,均和前述秦魏家三段墓葬的器物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只有 I 式双小耳罐、II 式单小耳罐及 VII 式单耳罐三种器物见于前三段。关于后者,还需作些说明。《报告》文字说明 II 式单小耳罐只有一件(M74:1),而在墓葬登记表中于 M53、M107 及 M120 却又各见到一件。同样,I 式双小耳罐在墓葬登记表中只见于 M89¹⁾、M98 和 M90,而在文字说明中却指明出土五件,以及《报告》说 VII 式单耳罐一件,登记表则载明 M8、M98 各有一件。这是否是排印失误?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三种器物的标本,前两种出自“三层”墓葬,后一种出自“二层”的 M8。其形态矮肥,而和秦魏家三段的器物形态瘦长截然不同。总之,“三层”八座墓葬和秦魏家三段墓葬的同类器物的形制区别较大,表明它们之间的年代存在相当的间距。

同时,在讨论秦魏家南墓地段别时,已说明以 H1 为代表的遗存早于以 H168 为代表的遗存,以及后者又早于“三层”墓葬,这样,可以把秦魏家诸遗存的年代及其代表性器物列成表七。

1) 《报告》墓葬登记表把 M89 的双小耳罐(I)排印成双耳罐(I),是错误的。《报告》在说明双小耳罐时,以 M89:3 作为双小耳罐的标本,并附有插图及图版。

表七 秦魏家诸遗存的年代关系

	碗	盆	折腹罐	瓶	单耳罐	双小耳罐	双大耳罐	高领双耳罐	豆	侈口罐	长颈罐	单小耳罐	双耳罐	隔
四	I		III		II、V、VII	I	II、V、VII VI	IV、V	III、V、VII			I	III	II
三	乙	I	III	I、III	II	II、V	IV	I、III	I、III、V、VII	III、IV	II	I、II	III	
	甲			I	I、II		III	III		IV		II		
二		VII	II		VI、VII	I	I	VII		V		II、IV、V		III
一	双大耳罐													
HI	罐形罍													

表七需补充说明两点：(1) IV 式双大耳罐共出三件，在 M120 及 M124 中，它是和 III 式高领双耳罐共生，出自 M134 的那件，则和 IV 式高领双耳罐伴出，而未见它和 V 式双大耳罐共出的例子，估计它基本上和 III 式高领双耳罐同时，虽然可以晚到 IV 式高领双耳罐出现的年代，但不会晚于用 V 式双大耳罐作随葬品的时候；(2) II 式隔和 II 式瓶同出于 M129，同时，去三足后的隔身形态，颇似 VIII 式单耳罐及 I 式单小耳罐，考虑到 II 式瓶、I 式单小耳罐在表中的位置，以及 VIII 式单耳罐当定在三乙的情况¹⁾，估定 II 式隔基本上应处在三乙阶段，也可晚到四段。

(三) 下面，讨论齐家文化其它遗存和秦魏家的年代关系。

大何庄和秦魏家的年代关系，本文第三节已进行了充分讨论。大何庄的第三段，是并含二、四段陶器组合的墓葬，按分段的标准器物，大何庄只需分为三段，即撤去三段，保留原来的一、二及四段。大何庄高领双耳罐及 I、II 式双大耳罐和秦魏家 IV 式高领双耳罐及 V 式双大耳罐的关系，以及大何庄的 I 式单耳罐、高领深腹罐及 II 式豆，分别和秦魏家 II 式单耳罐、II 式瓶 (M112:1) 及 VII 式豆雷同的情况，当知大何庄二、四段的年代，基本上相当于表七秦魏家四段。同时，F7 出土的那件高领折肩罐的年代，早于秦魏家 III 式高领双耳罐。那末，以 F7 为代表的大何庄一段，也就应早于上表秦魏家三段。又据第三节讨论高领双耳罐形态演进的趋势之意见，当把 F7 之高领折肩罐出现的年代，估定在秦魏家 VII 式高领双耳罐之后，即应认为大何庄一段的年代，在上表秦魏家二、三段之间。

1945 年，夏鼐先生在阳洼湾发掘两座齐家文化的墓葬，皆出形式雷同的双大耳罐，MI 的几件单耳罐和 M2 的双耳罐的器身形态，也基本相同，两墓的年代当大致同时。其双大耳罐

1) VIII 式单耳罐只见一件，出在 M37。它是南墓地四段的标准器物，因仅出一件，故在这表中删去。

酷似秦魏家 VI 式双大耳罐, MI:5 单耳罐的器身,也和秦魏家 IV 式双大耳罐的器身相似¹⁾,故这两墓的年代基本上应和表七秦魏家三乙段相当。

天水七里墩出土的高领双耳罐²⁾, 1956 年在水、甘谷调查采集见到的遗存³⁾,以及解放前齐家坪出土的大部分陶器⁴⁾,基本上和秦魏家表七的三段的同类器相似,其年代也应相当。

皇娘娘台四段,除去兼有二、四段标准器的三段外,实是分为三段。在讨论秦魏家南墓地二段,即以 H68 为代表的遗存年代时,已说明 H68:3 双大耳罐的形态,和皇娘娘台 M24 出土的双耳瓶雷同,从而认为秦魏家四段,也就是表七的一段的年代,当和皇娘娘台四段相当。从器物形态观察,皇娘娘台一、二、四段,尤其是二、四段,是自早到晚依次持续发展的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毋需待言,皇娘娘台二、一段,也依次早于表七中的秦魏家一段。

皇娘娘台陶器的器形,比起秦魏家“三层”墓葬出土陶器更显得矮肥的情形,以及这里的双大耳罐 (M38:12、M24)⁵⁾、I 式双耳折肩罐及侈口曲领罐,和秦魏家“三层”墓葬的 I 式双大耳罐 (M89:7)、VII 式高领双耳罐及侈口曲领罐 (M36:2) 的形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情况,从类型学上也可说明皇娘娘台的年代当在秦魏家“三层”墓葬之前。

皇娘娘台采集的那件甗,是鬲上加双耳折肩罐。从发表的照片看得很清楚,器身的绳纹分三段⁶⁾,即双耳折肩罐的腹部、鬲的上部和鬲足各一段。表明它的制作过程是:先接合三个模制的鬲足,形成甗的下部,再接制鬲的上部,最后制作上面的双耳折肩罐。这件甗上的双耳折肩罐,当和同地的 II 式双耳折肩罐属于一型,形制却较矮肥,领、肩也比较低短,按此类器物向流线型发展趋势,这件甗的年代,可能早到皇娘娘台一段。

从已发表的材料来看,在陇山左近以西甘肃及宁夏的黄河流域,都可见到以皇娘娘台墓葬为代表的遗存的踪迹。例如永靖王家庄、临洮杜家村发现的高领双耳罐和双大耳罐⁷⁾,和在皇娘娘台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⁸⁾;临夏雀家庄采集的彩陶双耳罐⁹⁾的形态,与皇娘娘台的雷同¹⁰⁾;临洮杨家咀出土的彩陶双大耳罐¹¹⁾,除施彩外,和皇娘娘台 F8:14 双大耳罐¹²⁾几乎一致。同时,

1)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考古学论文集》1—10 页,及图版叁、肆,科学出版社,1961 年。

2)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图版肆之 6,《考古学报》1960 年 2 期。

3)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渭河上游天水、甘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8 年 5 期图版贰,1—3、6。

4) M. Beltin-Althin The Sites of Chi Chia Ping and Lo Hantang in Kansu BMFEA. No 18, 1946.

5)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 4 期,图版肆,2。《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 2 期,图版伍,2。

6) 《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 4 期,图版拾,2。

7) 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通讯》1956 年 6 期,图版叁,2、5。

8)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 2 期,图版伍,1、6。《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 4 期,图版伍,3。

9) 同 7),图版叁,6。

10)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 年 2 期,图七,4、5。

11) 同 7),图版叁,7。

12) 《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 4 期,图版肆,5。

解放前在齐家坪也见过和F8:6一样的双大耳罐¹⁾。1960年,在宁夏西吉县兴隆镇清理的两座墓葬的葬式及头向²⁾,同于在皇娘娘台及秦魏家等地见到的确为齐家文化墓葬的情况。这两墓随葬的陶鬲均仅存残片,从M2的鬲足看,似已出现明显的足跟,而区别于皇娘娘台那件鬲足。秦魏家M36:1陶鬲是有足跟的。据此可知前者当晚于后者。兴隆MI随葬的双大耳罐自颈以下饰横篮纹似显得较早,但形态却和皇娘娘台M37:13双大耳罐相近,估计兴隆两墓的年代,约相当皇娘娘台二段。可见,难以把以墓葬为代表的皇娘娘台和秦魏家、大何庄不同的文化遗存,视为齐家文化的分布地域有所区别,年代上后者早于前者的不同的类型³⁾。至于分布于甘肃武威地区及青海东部的齐家文化皇娘娘台阶段的遗存,是否和陇山左近以西甘肃及宁夏的黄河流域的同时期遗存存在着地域差别,即可否是齐家文化的不同类型,由于目前发掘的材料较少,尤其是后者迄今仅限于调查、清理采集的资料,使这一问题只能留待今后去研究。

柳湾M267和临洮瓦家坪K82·5白灰面住室,从类型学比较,可认为依次略早于皇娘娘台一段,即F8为代表的遗存。

柳湾M267发表有篮纹壶、粗陶瓮、红陶罐、单耳杯及灰陶罐五件陶器⁴⁾。它的灰陶罐和皇娘娘台F8:9双耳折腹罐属于同型器,具体形态略有区别,即前者口领较直,腹部更为圆鼓,体型比较矮肥。M267的篮纹壶,口领呈圆筒形,肩部圆鼓,明显地区别皇娘娘台鬲上的双耳折肩罐的外侈的口领,和斜平的肩部。和M267篮纹壶形制类似的器物,是客省庄H206出土的陶罐。H206共发表三件器物,除上述罐外,还有鬲和瓮⁵⁾。瓮的形态,几乎完全同于割去圆筒形口领的M267的篮纹壶。据《沅西发掘报告》图四十之七和该地H168所发现的器盖及瓮的标本⁶⁾,知其制法是瓮“和器盖一起盘筑成,然后再割开的”⁷⁾。采用这制法的目的是使器盖能严密地盖合在瓮上。在柳湾齐家文化的M271中,也见到和客省庄H206陶瓮制法相同、形态类似的陶器⁸⁾。使用这种制法制作的陶器,除上述外,只见于半山和马厂期⁹⁾,而从未在皇

- 1) J. G. 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MFEA No 15, 1943.《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图二〇,9。
- 2) 钟侃、张心智:《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齐家文化遗址》,《考古》1964年5期。
- 3) 胡谦盈:《试论齐家文化的不同类型及其源流》,《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文物》1979年10期。前文认为以皇娘娘台及柳湾为代表的称之为齐家文化“乙型”的遗存,“分布在甘肃省武威地区和青海省东部”,把永靖、临夏、临洮见到的“乙型”遗存,视为这一类型分布的“东北缘”,它晚于以大何庄和秦魏家为代表的“甲型”并指出分布在武威地区及青海东部的“乙型”遗存,是齐家文化晚期向西向南扩大势力的结果。
- 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图二八、三〇、三三之左右及三四之左,《文物》1976年1期。
-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沅西发掘报告》图三六,1;图版叁陆,2、5,文物出版社,1962年。
- 6) 同5)之图三九,6;四十,6;图版叁壹,14;图版贰玖,4。
- 7) 同5)之66页。
- 8)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图29,《文物》1976年1期。
- 9) 这类材料很多,分别见于《文物》1978年8期56页图4,《文物》1975年6期82页图19和《考古学报》1982年2期图版拾叁,4。

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2 期

娘娘台一段以后的齐家文化,乃至以后的遗存中遇到。这说明使用这制法的年代较早。H206 陶鬲和皇娘娘台甗下的陶鬲相比,前者的鬲腿在鬲的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大于后者,即鬲腿的容积相对大于后者。按我在《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提出的认识¹⁾,皇娘娘台甗当稍晚于 H206 陶鬲。根据上述,柳湾 M267 的年代,当和客省庄 H206 相同,而略早于皇娘娘台的 F8。

至于瓦家坪 K82·5 白灰面住室²⁾的年代,只能据它出土的陶鬲³⁾进行讨论。我以前说过,它“形态上接近客省庄 H68 式鬲”⁴⁾,其腿呈鹰嘴形,和客省庄 H68:16 单把罐形甗相像⁵⁾。《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把 H68 陶鬲的年代,定在 H206 陶鬲之前,因之,瓦家坪 K82·5 白灰面住室的年代,也当在柳湾 M267 之前。

在上述齐家文化遗存年代序列的基础上,据直领圆肩罐(柳湾 M267 篮纹壶)、双耳折肩罐及高领双耳罐、双大耳罐和陶鬲形态递变,现可将齐家文化分为三期八段。

一期,包括瓦家坪 K82·5 白灰面住室、柳湾 M267 和皇娘娘台 F8 为代表的先后三段遗存⁶⁾。这期以直领圆肩罐和袋足鬲为代表性器形,三段开始出现直领折肩罐;

二期,包括以皇娘娘台和秦魏家“三层”墓葬为代表的四、五两段遗存。这期已不见一期的圆腹双大耳罐,代之而起的曲直腹或微折腹的双大耳罐,以及以双耳折肩罐和带有足跟的袋足鬲为这期的代表性器形;

三期,包括大何庄 F7 和前述“秦魏家诸遗存的年代关系”表中三、四段为代表的六、七、八这三段遗存。这期陶鬲已进入衰落形态,高领双耳罐代替了双耳折肩罐,双大耳罐显得瘦长,腹部多半呈圆曲线条。瘦长是这期陶器的主要风格。

三期一段的大何庄 F7 已测定的两个碳十四年代数据,按达曼表得出的树轮校正年代分别为公元前 2050 ± 115 年和 2010 ± 115 年,约当夏朝的起始年代。故据此可认为三期已进入夏纪年。一期二段的年代约相当于客省庄文化晚期,或三里桥龙山期,或王湾三期,有关这时期的王湾 H79、煤山 F6、T13③B、汤阴白营 F42、F55、后岗 H2、H5 等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⁷⁾,基本上是在公元前三千年后半叶之前段范围内。一期一、三段,约在二段前后不远。故一期的年代当在公元前三千年后半叶之前段左右。二期的年代应估定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后半叶之后段范围内。

1) 《考古与文物》1980 年 4 期。

2) 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初稿》,未刊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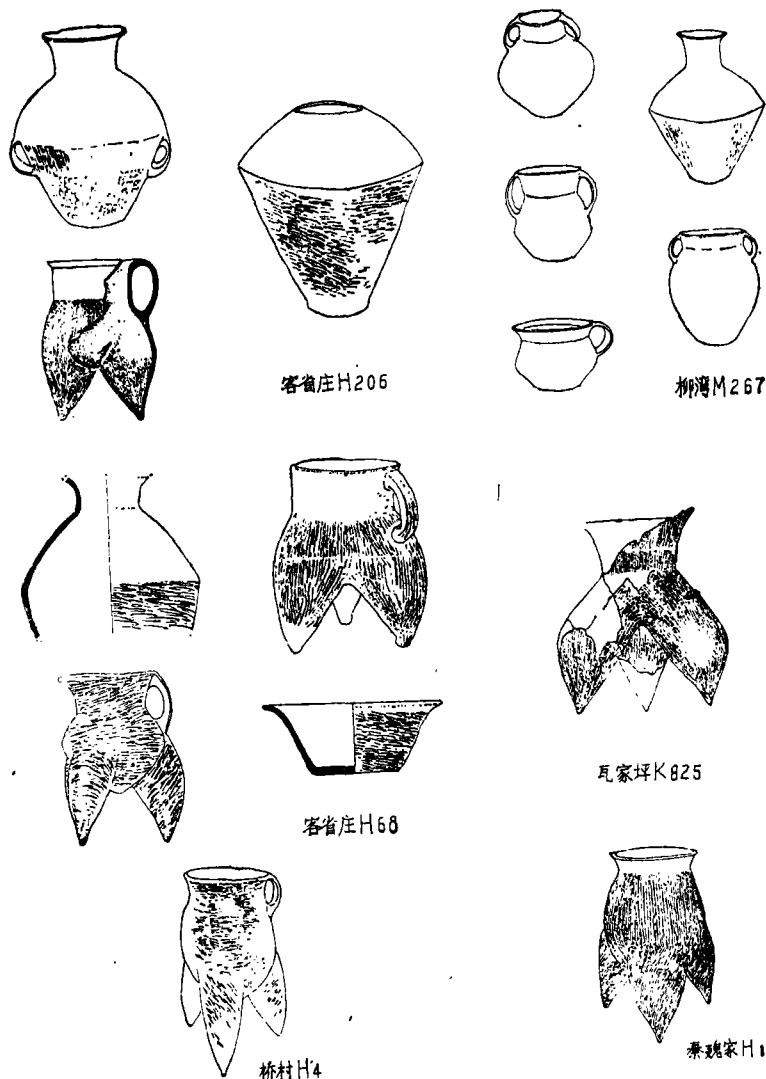
3) 原报告称鬲,同 2)。石陶:《黄河上游的父系氏族社会——齐家文化社会经济形态的探索》一文转引原报告插图说明中称鬲,《考古》1961 年 1 期。

4) 张忠培:《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 年 4 期。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津西发掘报告》图版贰陆,2,文物出版社,1962 年。

6) 属于一期的遗存还有寺咀坪住址,至少是这里的二、三号住室。限于仅见陶器残片,故段属难以确定。参见任步云:《甘肃秦安县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考古通讯》1958 年 5 期。

7) 这里所谈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 年。



图三 桥村 H4 客省庄 H68、206 与秦魏家 H1 瓦家坪 K82、5
柳湾 M267 出土陶器比较图

可见,目前见到的并被学术界作为主要对象研究的齐家文化遗存,即本文所说的齐家文化三期中的三至八段,均晚于客省庄文化(图三)。从这个意义上说,齐家文化是年代、地域均和客省庄文化有所区别的一种考古文化遗存。

从地层上看,齐家文化晚于马厂期¹⁾,甚至某些器形也显示齐家文化和马厂期存在着某种因缘。但从两者陶器的基本组合,尤其是从马厂期陶器演变的基本趋势,以及拿齐家文化一期

1)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1期。

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2 期

一、二段和马厂期陶器进行比较研究来看,则难以认为齐家文化是马厂期的直接继承者。至于齐家文化和马厂期的某些陶器的相似情形,只能认为是不同谱系的考古文化之间的假借和因袭。

秦魏家 H1 和宁夏德隆县上齐家墓葬¹⁾,可能是齐家文化居民的先辈所留下的遗存。

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不少考古学同行,曾都将秦魏家 H1 划入齐家文化。《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²⁾认为秦魏家 H1 属齐家文化的同时,也指出 H1:1 这件罐形甗是齐家文化罐形鬲的前身。甗是分裆,鬲是联裆。分布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空三足器的具体形态、用途虽存在差异,但都以分裆或联裆作为相互区别的特征。一般来说,年代上分裆在前,联裆在后,而且所属的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又往往不同。例如:桥村 H4³⁾和客省庄 H206⁴⁾;庙底沟二期与三里桥龙山期遗存⁵⁾;磁县下潘汪 F1⁶⁾和后岗 H2⁷⁾;乃至使用甗式鬲的大汶口文化和使用鬲式鬲的龙山文化,等等,都表明分裆和联裆空三足器所属的遗存的年代及文化内涵是有区别的。因此,在未充分了解 H1 为代表的遗存内涵,并有把握确定它属齐家文化的情况下,比较妥善的办法是将两者区分开来,同时,考虑到两者分布于同一地区,以及罐形甗和罐形鬲的渊源关系,而暂将 H1 为代表的遗存视为齐家文化的前身,或许较能贴近日后发现的事实。

“常山下层文化”的提出⁸⁾,促进了齐家文化渊源的研究。可否把六盘山、陇山东西两侧“常山下层文化”阶段的遗存,都归入“常山下层文化”?在资料尚不充分以致难以认识这类遗存的内涵、特征、性质,和估计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渊源可能有所区别的情况下,正如不能把秦魏家 H1 和桥村 H4 等同起来一样,也暂不宜把西吉县兴隆镇及上齐家视为和镇原常山下层一样的遗存⁹⁾。

宁夏西吉县兴隆镇采集的單耳罐,和见于下齐家而很可能是出自墓葬的双耳壶、单耳瓶以及单耳罐¹⁰⁾,均为红色,陶器表面除磨光外,已基本成为装饰的附加堆纹相当发达,有锥刺或“指甲”的印纹,篮纹都是横向的,绳纹酷似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同类纹饰。这些情况,显示它的年代早于秦魏家 H1,而接近庙底沟类型的时期。同时,这些器物多半具有单耳或双耳,最初发现时把它们归入齐家文化虽有些失误,但这一认识却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了它们和齐家文化陶器颇为相似的情况。事实上,即使越过秦魏家 H1 为代表的遗存,甚至也可以在本文

- 1) 钟侃、张心智:《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齐家文化遗址》,《考古》1964年5期。
- 2) 《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 3) 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 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津西发掘报告》图三六,1;图版叁陆,2、5,文物出版社,1962年。
-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 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
-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春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5期。
- 8) 胡谦盈:《试论齐家文化的不同类型及其源流》,《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原常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3期。
- 10) 钟侃、张心智:《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齐家文化遗址》,《考古》1964年5期,图版肆,1—4;图二,3、8。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下)

所说的齐家文化一期二、三段,乃至二期的陶器中,找到上齐家双耳壶、单耳瓶及单耳罐的演进形态。可见,兴隆和上齐家遗存是目前能推知的齐家文化的较早源头。

在年代上继齐家文化之后,于齐家文化分布地域内出现了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有的学者认为卡约文化是齐家文化的后继者,有的学者认为辛店文化是继齐家文化发展来的,等等不同的认识。但目前所确定的这些文化的最早年代的材料,仍然和本文认为的齐家文化晚期的文化面貌、特征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以致难以肯定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文化联系。齐家文化的发展方向,有待今后研究。

六 社会发展阶段

这里,试图从合葬墓、墓地和产业结构及社会分工的分析,来研讨社会发展阶段。

(一) 合葬墓的分析

现将皇娘娘台、秦魏家和大何庄四处墓地的合葬墓的情况,统计成表八。

表 八

墓地	期别	段别	墓号	年龄、性别	葬式	随葬器物	备注
皇娘娘	II	二	29	成人 2	左,仰身直肢 右,侧身屈肢	双大耳罐 AIII 2、双耳折肩罐 AII、碗 B、直口罐 B2、双小耳罐 BII2、BIV、单耳罐 BI、单耳罐 AII3	
		二	52	成人♂ 成人♀	左,仰身直肢 右,侧身屈肢	双大耳罐 AIII、双耳折肩罐 AII、尊 AII、豆 BII、单耳罐 AII3、直口罐 B、单耳罐 BII、石璧 20、猪下颞骨 7、小石子 290	骨架涂红色颜料
		二	65	成人 1 小孩 1	侧身屈肢	尊 AII、单耳杯 A、侈口罐 BII、单耳罐 BII4、石璧 8(在小石子内)、小石子 84	
		三	38	成人♂ 成人♀	左,仰身直肢 右,侧身屈肢	双大耳罐 AI、双耳折肩罐 AI、尊 AII、双耳罐 AI、豆 AII、单耳罐 BII2、石璧 5、绿松石珠 6、小石子 53	
		三	46	成人 2	左,仰身直肢 右,侧身屈肢	双耳折肩罐 AII2、尊 AII、单耳罐 AII3、双小耳罐 BI、BII、BIV、单耳罐 BI、BII、石璧 6(在小石子内)、猪下颞骨 2、小石子 216	
		三	54	成人 2	左,仰身直肢 右,侧身屈肢	双耳折肩罐 AII、碟 A、单耳罐 AII 4、壶 AI、双小耳罐 BV、BVI、单耳罐 BII2、侈口罐 BI、绿松石珠 6、猪下颞骨、小石子 5	
		四	24	成年男性 1 成年女性 2	男仰卧正中, 女两侧侧身屈肢	随葬陶器 16、残铜锥 1、绿松石珠、石璧	
		四	27	成人 1 小孩 1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双大耳罐 AII、双耳折肩罐 AII、双小耳罐 AII、灰陶豆 AI、单耳罐 AII、壶 AII、双小耳罐 BIV2、偏耳罐 B、石璧、小石子 28	在 H43 内

续表

墓地	期别	段别	墓号	年龄、性别	葬式	随葬器物	备注
娘台	II	四	30	成人 2	左, 仰身直肢 右, 侧身屈肢	双大耳罐 AII2、双耳折肩罐 AII2、尊 AII4、碗 A、侈口曲颈罐 A、双耳罐 AI、AII、双小耳罐 BII4、AIV2、豆 AII、单耳罐 AII6、壶 AI 直口罐 B、双小耳罐 BI2、BII3、BIV4、单耳罐 B、石壁、猪下颞骨 5	
		四	48	成人♀ 成人♂ 成人♀	左, 侧身屈肢 中, 仰身直肢 右, 侧身屈肢	双耳折肩罐 AII、三耳罐 A、尊 AII2、豆 BII、单耳罐 AII3、双小耳罐 BI、敞口罐 A、石壁 83、玉璜、小石子 304	骨架涂红色颜料
		四	57	成人 2	乱葬	双耳罐 AI、侈口罐 BI	在 H55 内
		四	68	成人 2	乱葬	双大耳罐 AII、单耳罐 AII2、双小耳罐 BIV、石壁	在 H58 内
		四	76	成人♂ 成人♀	左, 仰身直肢 右, 侧身屈肢	侈口双耳罐 A、单耳罐 AII3、双小耳罐 BI、BIV、侈口罐 BI、石壁 2、小石子 64、粗玉石片 4	
		不	1	儿童 4	侧卧屈肢	陶器 5	
			10	成人 1、 儿童 1	仰身直肢		
			28	成人 2	不明	石壁 3、石凿 III、猪下颞骨	
			58	成人 2	左, 仰直 右, 侧屈	石壁 2、猪下颞骨	
		明	66	成人 3	左, 侧身屈肢 中, 仰身直肢 右, 侧身屈肢	石壁 15	骨架涂红色颜料
			71	成人 2	左, 仰身直肢 右, 侧屈	石罐、绿松石珠 4	
秦魏家北	III	一	108	56+♂ 36—55♀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双大耳罐 III、高领双耳罐 III、瓶 II、敞口罐 III、侈口罐 VI、猪下颞骨 12	
		二	105	21+♂ 21+♀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盆 IV、双大耳罐 III、高领双耳罐 IV、折腹罐 I、瓶 I、单小耳罐 II、猪下颞骨 10	
		不明	124	成年♂(?) 21♀(?)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碗 III、双大耳罐 IV、VI、高领双耳罐 III、侈口罐 III、VI	
			134	成人 1 儿童 1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绿松石珠 1、双大耳罐 IV2、高领双耳罐 IV、侈口罐 III、IV、猪下颞骨 15	
			138	成人 2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石凿 I、高领双耳罐 III、小石块 35	
		四	30	21+? 儿童♀?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骨针 I、骨匕、绿松石珠 14、豆 III、高领双耳罐 III、单小耳罐 I、侈口罐 VI、猪下颞骨 4	
		四	37	成人 2	俯身屈肢 侧身	骨针 I、豆 VII、高领双耳罐 III、单耳罐 VIII、侈口罐 VI、猪下颞骨 18、小石块 12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下)

续表

墓地	期别	段别	墓号	年龄、性别	葬式	随葬器物	备注
秦 魏 家 南	III	四	60	成人 2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骨针 I、双大耳罐 IV、高领双耳罐 III、双耳罐 III、猪下颚骨 6、小石块 10	
		四	65	21+♀ 7±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石铲、豆 III、双大耳罐 IV、高领双耳罐 III、侈口罐 VI	
		四	115	成人 2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豆 II、高领双耳罐 III、单耳罐 III、侈口罐 VI、长颈罐 II	
		五	52	成人 2	俯身直肢 侧身屈肢	豆 V、双大耳罐 IV 高领双耳罐 IV、侈口罐 VI、单小耳罐 IV、猪下颚骨 55、小石块 40	单小耳罐 IV 未列入, 据《报告》84 页说明知 M52 出此器物
		五	95	成年♂ 21+(?)♀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双大耳罐 V、高领双耳罐 III、侈口罐 VI、猪下颚骨 5	
		五	103	成人 2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绿松石珠 I、豆 V、双大耳罐 IV、高领双耳罐 IV、侈口罐 VI、猪下颚骨	
		六	3	成人 1 婴儿 1	仰身直肢 ?	碗 I、高领双耳罐 IV、单小耳罐 I、侈口罐 VI	
		六	6	36—55(?) ♂ 6—7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骨匕 IV、豆 II、双大耳罐 II、高领双耳罐 IV、单小耳罐 I、猪下颚骨 68	
		六	42	成人 1 婴儿 1	仰身直肢 ?	绿松石珠 I2、碗 III、双大耳罐 V、高领双耳罐 IV、侈口罐 VI、猪下颚骨 5、小石块 18	
		六	81	成人 2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石凿 I、绿松石珠 I、双大耳罐 V、高领双耳罐 IV、侈口罐 VI	
		不明	2	成人 2	不清		
			18	21+♂(?) 21+♀(?)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猪下颚骨 12	
			45	成人 2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骨针 I、骨匕 VI、豆 VIII、高领双耳罐 II、瓶 II、侈口罐 VI	
			50	成年♂ 56♀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骨匕 III、牙饰、猪下颚骨 34、小石块 13	
			51	36—55♂ 6—7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骨锥 IV、骨匕 VII、豆 II、侈口罐 IV、单小耳罐 I、双耳罐 IV、穿孔骨器、小石块 3	
			85	成人 2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豆 V、侈口罐 IV	
			97	36—55♀ 6—7	仰身直肢 侧身屈肢		
大 何 庄	III	2	70	小孩 3	甲仰身直肢 乙? 丙屈肢	侈口罐 BI、IV	
		3	55	成人 1 婴儿 1	仰身直肢	侈口罐 AII、BII、III、双大耳罐 AI、高领双耳罐 A、猪下颚骨 2、小石块 9	
		不明	84	小孩 3	仰身直肢		

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2 期

表八中期别、段别是指本文对齐家文化的分期和对墓地的分段。现将表中所见现象分析如下。

1. 属二期四段的皇娘娘台墓地第四次发掘的合葬墓共计十六座,占同次发掘墓葬总数(六十二座)的 25.8%,合葬墓的死者三十四人,占墓地埋葬人数(八十)的 42.5%;基本上属三期七段秦魏家北墓地内的合葬墓有五座,占该墓地墓葬总数(二十九座)的 17.3%,合葬墓的死者十人,占墓地埋葬人数(三十四)的 29.4%;基本上属三期八段的秦魏家南墓地内的合葬墓十九座,占墓葬总数(九十九座)的 18.1%,合葬墓的死者三十八人,占葬于墓地死者总数(一一八)的 32.2%。大何庄共计发现八十二座墓,1—8 岁的儿童墓达五十五座之多,占墓葬总数的 67.1%,而且,这里的墓葬基本上与居住遗存杂处,墓葬的排列和邻近的秦魏家两处墓地相比,显得杂乱无章,因此,大何庄和前述两地三片墓地的性质当有所不同。故本节不把大何庄列入考察范围。皇娘娘台和秦魏家的情况表明,齐家文化二期四段和三期七、八两段均流行合葬制,前者更甚。由于武威和永靖分别地处石羊河、黄河,或许这两地流行合葬制的程度上的差别,只是齐家文化的不同地域的居民的葬习略有区别的反映。

2. 就墓中死者的年龄结构来看,可分成成人合葬墓、成人与儿童(含婴儿)和儿童合葬墓。三处墓地的情况可列成表九。

表 九

皇 娘 娘 台			秦魏家北墓地		秦魏家南墓地	
成 人	成人、儿童	儿 童	成 人	成人、儿童	成 人	成人、儿童
15	3	1	4	1	12	7
78.9%	15.7%	5.2%	80%	20%	63.1%	36.8%

可见,最盛行的是成人合葬,其次是成人及儿童合葬,儿童合葬只是个别的现象。

成人合葬墓有二人和三人合葬二种。三人合葬墓仅见于皇娘娘台,计三座,占这里成人合葬墓总数的 20%。鉴于皇娘娘台和秦魏家两处墓地同时存在着年代和地域的差别,使人们难以认定三个成人合葬墓未见于秦魏家二处墓地的原因。

皇娘娘台的两座三个成人合葬墓经鉴定,都是一男二女。根据葬式,也可推定未经鉴定的 M66 内的死者,当亦是一男二女。

三处墓地中的两个成人合葬墓共计二十八座。皇娘娘台的 M52、38、76 和秦魏家的 M108、105、124、95、50、18 等九座墓葬中的死者,经鉴定均为一男一女。据葬式可推定其余十九座也都是一对男女的合葬墓。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下)

皇娘娘台的三座三个成年男女合葬墓中的男子,均仰身直肢居墓中部。两侧的女子,侧身屈肢,面向男子,双手屈于面前,显出侍奉、屈辱的状态。一对男女合葬墓的葬式,也都活现出男尊女卑的状况¹⁾。个别墓中的女性的葬式,还透露出她生前作过一番挣扎的情形,例如皇娘娘台的 M76,墓中的女性似经捆绑,背向左侧的男子,双手并拢举于前方。

凡作出确切年龄鉴定的成对男女合葬墓,例如秦魏家 M18、105、108 男女的年龄,都是相仿佛的。看来,年龄配对是合葬墓中成对男女的一个特点。从墓中随葬器物的位置观察,虽则男子无例外地占有较多的随葬品,但女子也不是一无所有。例如皇娘娘台 M38,男女口内各含绿松石珠三枚,男子贴身玉璧五件,女子也有三件, M52 男女尸体上均有红色颜料;秦魏家 M105 两具骨架上均有红色布纹痕迹,表明他们衣著颜色相同;甚至前述似经捆绑埋入 M76 的女子,也和同墓穴的男子一样,其腰部亦置石璧一枚。这些情况说明,成对男女合葬墓中的女子,并非象征妻子的女奴,而是墓中男性的真正的妻子。

至于皇娘娘台三座有三个成年男女的合葬墓,其中二女子的情况则略有区别。例如, M24 右侧女性腰间随葬残铜锥一件,右臂时配戴一件石璧,颈项佩饰钻孔绿松石小珠数枚,而左侧女性仅颈项佩饰数枚钻孔绿松石珠; M66 左侧女性身上有石璧二件,蹲在右侧的女性一无所有; M48 两位女性骨架上均有红色颜料,但右侧女性较年青。据此可推定墓中的一位女性当是男子的妻子,另一女性则是男性的妾。齐家文化成人合葬墓内的死者,实行一次葬,同时埋入墓穴,故他们当是在相近时间内死亡的。合葬墓数量众多,且女性地位卑下,难以把她们和男子同穴的原因,说成是诸如同时病故而自然死亡的。无疑,这类合葬墓中的女性,当是妻妾殉葬制下的牺牲品。

上述合葬墓中的女子,是男性的妻子,还是象征妻子的女奴?这在考古学中引起过讨论。前面我们已据合葬墓中男女随葬品的情况,肯定成对男女合葬墓的女子及一男二女墓中的一位女子,当是同墓中男性的妻子。而认为是女奴的学者,则是据民族学材料说用妻殉葬会引起妻方氏族的反对,而否定是妻子的主张。

其实,妻子的地位,取决于父系氏族制及奴隶制的发展状况。在发展的父系氏族制即父权制时代,妇女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在民族学的材料中,也有不少关于丈夫对妻子有生杀予夺之权以及妻子为丈夫殉葬的现象。例如傣人中的“丈夫把妻子打死,妻家虽然气愤,却不会因此而引起血族复仇。帕各木·休都的堂姐青布赛被卖给杜西·包肖为妻。包肖后来又买了妻子,就把青布赛降为奴隶”²⁾;“云南福贡贡山的怒族,解放前,仍处在父权制发展阶段。……如系夫妇合葬,则妇女面向男子屈肢侧葬。这种墓葬形式反映了……妇女屈从于丈夫的屈辱情

1) 皇娘娘台的男性仰身直肢居左,女子侧身屈肢在男性的右侧。秦魏家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葬式基本上同于皇娘娘台,但男女在墓穴中的位置则相反。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地域,还是年代,目前难以确定。

2) 吴从众:《傣人父权制的家庭与婚姻》,《民族研究》1980年1期。

形”¹⁾；“蔡家苗在贵筑、修文、清镇、威宁、平远等州县，翁媳不通言，居丧三日，不食稻鱼，惟饘稗粥，夫死以妇殉丧，妇家夺去，乃免”²⁾。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父权制家庭的民族学资料指出：“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的家庭。……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³⁾。齐家文化的上述成人合葬墓，正是这种罗马的父权在埋葬制度方面的表现。

齐家文化的父权也表现在对子女的关系上。在皇娘娘台及秦魏家三处墓地，共见到成人和儿童的合葬墓九座。其中 M6、51、65、97 中的成年人的性别经过鉴定，知前两墓均为男性，后两墓都是女性。推测成年女性和儿童的合葬墓可能是离异了婚姻的母亲和其子女的合葬墓⁴⁾。从 M6、51 中死者的岁差来看，墓内的成年男性无疑都是同墓中的儿童的长辈。两墓中的成年人均为仰身直肢，居右，都有贴身的随葬品，同墓中的儿童居左，侧身，甚或屈肢面向男子，无随葬品，充分显示出长尊幼卑的状况。

妻妾殉葬制在尚处于父权制时期的苏联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诸考古文化中均大量地发现过。例如阿姆河⁵⁾及哈萨克⁶⁾均见过这类性质的墓葬，尽管在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还保留着这种葬制的少量的残迹⁷⁾，但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的商周时期的商·周文化中，绝不见这种葬制。因此，妻妾殉葬制的盛行，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它是父权奴隶制的产物，又是奴隶制尚不发达的标志。

(二) 墓地的分析

《周礼·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现代民族学对墓地亦有不少记述。莫尔根在《古代社会》曾介绍了一些印第安人，尤其是伊洛魁部落墓地的情况⁸⁾，我国民族调查资料也有不少墓地记录：宁夏县大兴公社新民村的纳西族实行火葬，每“姓”人家都有一个火化场，叫“烧人坪”。在坪上，从上到下分为十个台级。第一台为专门焚化喇嘛之处。第二台名老人台，一般 50 岁以上有子孙的人就可在此焚化。第三至九台分别烧 40—50 岁、30—40 岁、20—30 岁、13—20 岁、7—13 岁……的人，第十台烧非命者。每个年龄台级上火化的死者，又按性别分区火化，男性在左边，女性在

1)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怒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 年。

2) 李宗昉：《黔记》。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52—53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4) M65、97 中的死者年龄分别为 21 岁以上、7 岁左右和 36—55 岁、6—7 岁，据她们的年龄差距，M97 中的成年人无疑是同墓中的儿童的长辈，在早婚的情况下，M65 中的成年人，也可能是同墓中的长辈。即使在父权制的情况下，不少的民族学资料证明，离婚的妻子，也能分得和其丈夫共生的子女，尤其是女儿。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

5)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Акча-Дарья», «Низовья Амударья Сарыкамыш узбой» Москва 1960 年。

6) К. А. Акишев: «Саки семиренья»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Том 7, Алма-Ата 1959 年。

7) 洛阳博物馆：《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考古》1978 年 1 期。

8)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80—81 页，160 页，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 年。

右边¹⁾；云南澜沧县糯福寨的拉祜族墓地以寨为单位，葬在一起，大体上是老年者葬于上方，青年儿童葬于下方，男左女右，仰面而葬²⁾；白沙县第一区南溪乡什甫、什茂、禾好三村的黎族的村坟地，按不同姓氏分配一定位置。男坟在山上，女坟在山下；男坟中老人在左，其余在右；女坟则不论³⁾。可见，从古代以来一直到现今的许多民族的墓地的安排，都是遵循某种原则的。不难看出，安排墓地的规则或原则，最终受社会组织所制约。因此，考古学就可透过墓地的布局，去探讨、研究墓地的居民社会组织。

秦魏家南、北两片墓地保存完整，并得到全面揭露，为探讨墓地的布局，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先讨论秦魏家南墓地。

南墓地九十九座墓葬，均属于同一层位，自北至南整齐地分为六排。如果我们把对墓葬的段别的认识⁴⁾和墓葬的位置结合起来观察(图四)，就可发现：一排(以自北至南为序)西边八座已被确定年代的墓葬，其相近的两墓是依 IV、VI 段别的序列，依次循环地从西向东排列；三排西边已被确定段别的十座墓葬，除 M19、21 同属 IV 段外，也如一排一样，是自西依 IV、VI 或 V、VI 循环地往东排列；在其它排中，除二排 M6—40 挨近的七座墓葬属 VI 段外，其它邻近的两座墓葬(如依前述以两墓为一组进行观察的话)基本上属于早晚不同的段别，少数也有的同时。可见，南墓地任何一排墓葬，都不是依年代顺序从一头向另一头自早至晚地安排的，而是被分割成若干个墓组。墓组基本上由两座年代不同的墓葬组成，也有由同期的两座墓葬编成一墓组的。如果这一观察不误，那么，便可认为在建成南墓地之前，必定设计出一比较完整的方案：(1) 规划墓地；(2) 划分排列；(3) 将一排列分割成若干墓组。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现今见到的如此整齐的排列，才能将不同时间死亡的人安葬在一个墓组。

其实，南墓地还有一已开始建造而未形成的墓地。这便是由 III 段的八座墓葬组成的一墓地。按本文提出的齐家文化分期，这八座墓葬被定在 5 段，南墓地基本上位于 8 段，它们又属于不同的层位。因此，当把这八座墓葬视为另一码事。如果，我们依据南墓地的排列来观察这八座墓葬的位置的话，就可看到一些颇值得重视的现象：(1) M43、36，M53、74、75、89、M98，M109，分别位于南墓地一至四和六排；(2) 除 M43、36 位于南墓地一排的中间外，其它诸墓均位于二、三、四、六排的一头；(3) M43、36、M53，M74、75、89 和 M98 之间的南北间距，约略和南墓地排列之间的距离相等。这些情况表明，安排这八座墓葬的人们，也是按预先设计的方案，或习俗成例依排列埋葬死者的。可见，按成例规划墓地并非始于南墓地时期，而是这里齐家文化居民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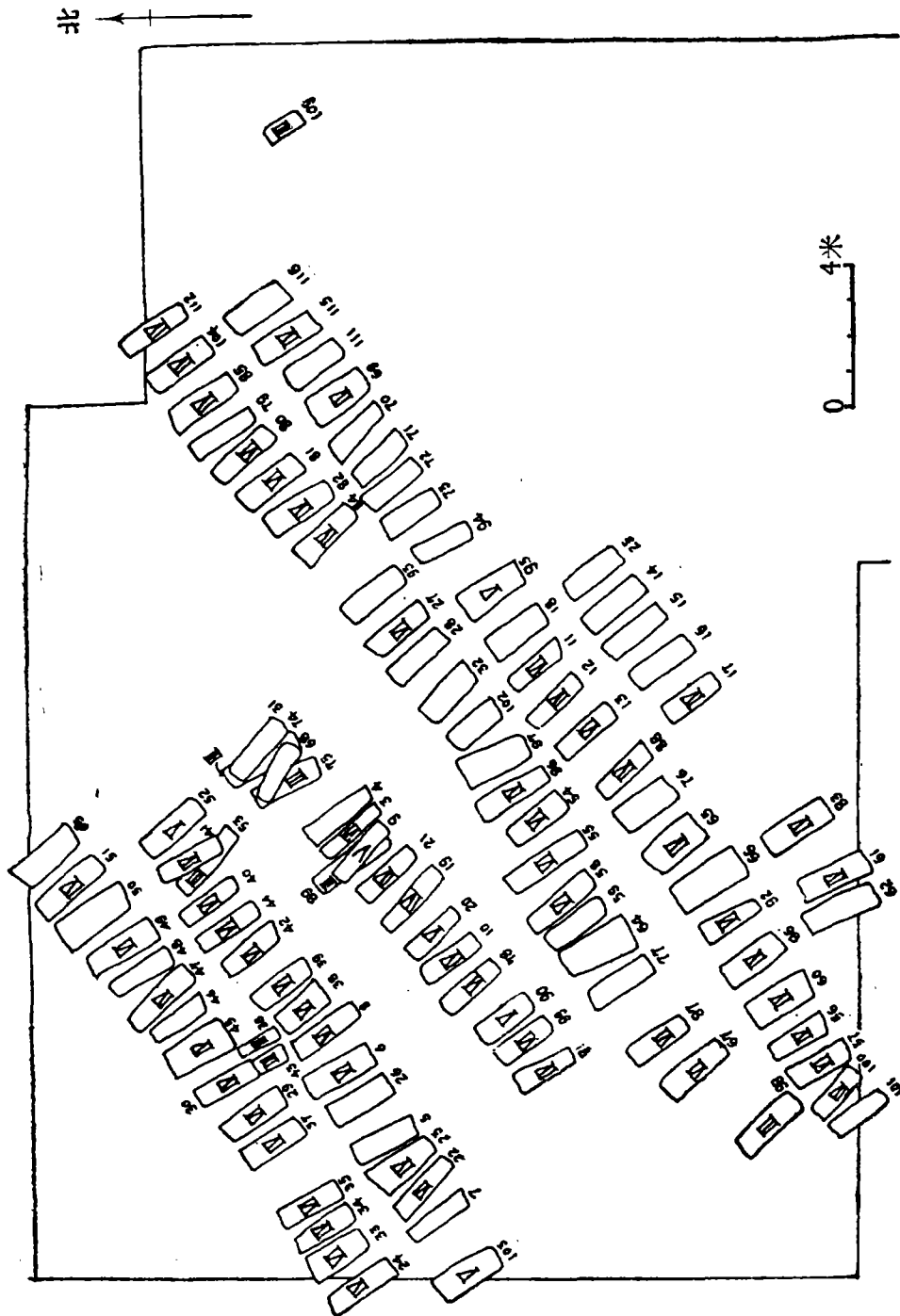
1) 王承权等：《宁蒗县大兴公社新民村纳西族的生活习俗》，《云南四川纳西族文化习俗的几个专题调查》172 页。

2) 徐志远等：《澜沧县糯福区糯福寨拉祜族社会调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一) 33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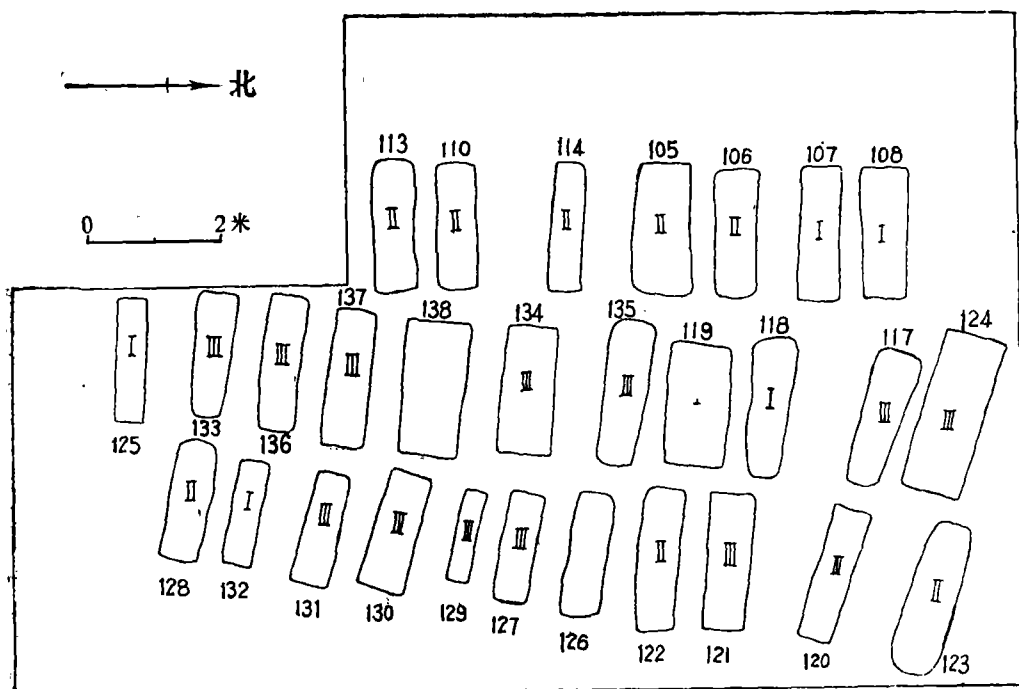
3) 《白沙县第一区南溪乡什甫、什茂、禾好三村“本地”黎情况》，《海南黎族情况调查》四分册，68 页。

4) 这里的段，不是本文分期的段，而是墓地的分段。

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2 期



图四 秦魏家南墓地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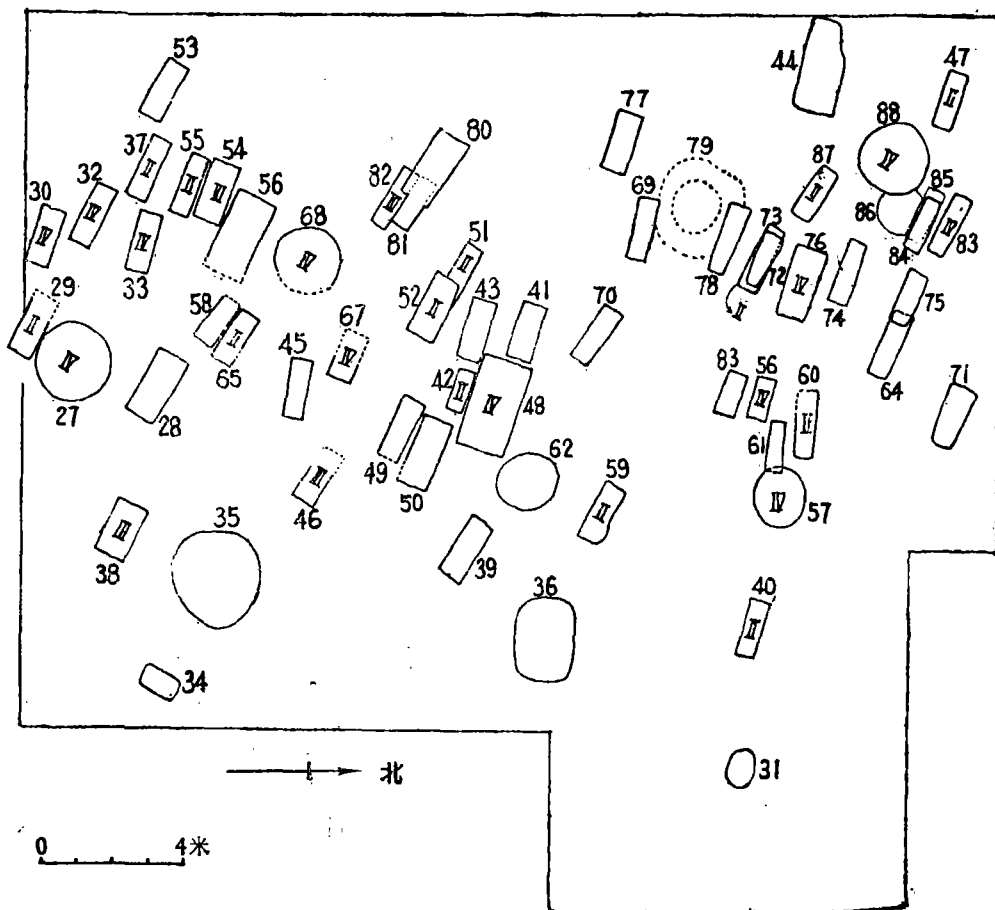


图五 秦魏家北墓地平面图

下面再看北墓地。这里的二十九座墓,也都属于同一层位,自北至南整齐地分为三排,甚至一、二和二、三排(以北→南为序)的间距相等,自然也是按一定规划而形成的墓地。从带有墓葬段别的《秦魏家北墓地平面图》(图五)¹⁾可以看出,它和南墓地之间,有着一些明显区别的现象:(1)同一段的墓葬,在排列的位置相对集中,例如一排北头两座都是 I 段,自此往南依次排列的五座,均属 II 段;(2)同排在位置上联接的墓葬,北头的年代一般早于南头;(3)二排的墓葬,从位置上看,似可分为三组,即 M124、117 和 125 各为一组,剩下的位于它们中间的八座墓葬也是一组。组间的空间距离,较墓葬的间距大一些。从年代上看,如把(1)、(2)两点现象结合起来考虑,也是可以将这排分拆成三组的。可见,如暂不考虑 M122 的话,似可将北墓地分为排列位置联接和年代早晚基本衔接的四个墓组,即:一排及二排的 M124、117 为一组;二排中部,即除去两头的 M124、117、125 后,剩下的八座墓葬为二组;二排的 M125 和三

1) 我们在讨论北墓地别时说过, M120、124、134 三墓至早和 III 段同时,又讲过 M135 的年代,和这三墓约略同时。故图五暂把 M120、124、134、135 四座墓葬定为北墓地 III 段。关于 M129,在《秦魏家北墓地段》一文中,曾对它的随葬器物进行过比较,而未确定它的段别。我们说过 M129 出土的 II 式单把罐形扁的器身,和 I 式单小耳罐的形态相似。从本文五节中的《秦魏家诸遗存的年代关系》表中,可知 I 式单小耳罐的年代可延至 IV 段,并说 II 式扁基本上在三乙阶段,也可晚到 IV 段,且在图三中,将它排在 7、8 段之间。这样,图五也暂将 M129 编在北墓地 III 段。

排北边的九座墓葬为三组；三排南头的 M132、128 列为四组¹⁾。每一墓组的墓葬，基本上在一排列，也就是说，墓组与排列大致吻合。故这里的排列，不像南墓地那样，分割成许多墓组，同时，这里墓组所含墓葬的数量，也远较南墓地诸墓组所有的墓葬多得多（北基地的第四组，无 III 段墓葬，是一不完整的墓组，故当别论）。



图六 皇娘娘台第四次发掘墓葬平面图

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皇娘娘台第四次发掘墓葬平面图》(图六)，显示出来的墓地布局，和前二处墓地呈排列式的条形结构不同，是块状形的结构。皇娘娘台先后经过四次发掘，我们见到的平面图只含第四次发掘的墓葬，而且，皇娘娘台未全面揭露，难以了解它的整体布局。从图六来看，第四次发掘的墓葬大致可分成由南至北的三块，块间略有空隙。一块（以南→北为序）位于基地的南部，M68、65 等几座墓葬是它的北端。二块位于基地中间，其南以 M52、

1) 南墓地也可能如北墓地这样，有的墓排实际上是可以拆开的，例如三排 M103 和 M7 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M103 可能是一排的。但目前无法了解，只好以墓排为小于墓地的单位。

67、45 为其南缘，北境可包括 M70、59、36。三块的南境至 M77、69、83 为止。每块中间未埋墓葬，留着一大小约略相等的空地，墓葬绕中间空地略呈环形排列。二、三块在这中心空地上安排了二、三座墓葬，其中包括引人注目的合葬墓。三块中间空地里埋着 M76，二块安排包含一男二女的 M48 这样大型的合葬墓。尽管如此，这些块内中间的空隙地仍令人一目了然。目前，我们尚不能从墓葬的位置与年代弄清楚这些墓块的布局。每一墓块都包含不同年代的墓葬，也说明墓块的区别不在年代，空间是区分墓块的唯一因素。所以，形式上皇娘娘台的墓块和秦魏家南、北墓地的排、组虽有所区别，其实质则同。

前面说过，比皇娘娘台晚一段的秦魏家三层八座墓葬组成的墓地，也如南、北两墓地一样，呈排列式的条形结构。因为这片墓地的年代只比皇娘娘台晚一段，或许可据此推测，分布在甘肃中部相当皇娘娘台年代的齐家文化墓地的结构，也是呈条形的，即条形结构是甘肃中部地区的传统。但目前的资料，使我们不能肯定条形和块形结构是不同地区的齐家文化的传统，还是条带结构是从块状结构发展来的。

墓地的统一与分割，是死者生前社会组织的联结与区分，统一和分化的形象反映。共处一考古文化墓地的死者，生前当是一人们共同体。分割墓地的那些单位，即南墓地的排、北墓地的墓组和皇娘娘台的墓块的死者，生前的社会组织，是在以墓地为代表的共同体内、较小的次一级人们共同体。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南墓地和北墓地及皇娘娘台墓地的区别，则是前者比后者多出一级更小的人们共同体。也就是说，南墓地死者生前的社会组织分为三级，北墓地及皇娘娘台死者生前的社会组织只分成两级。

皇娘娘台、北墓地及南墓地的夫妻(妾)合葬墓，分别占同地墓葬总数的 22.58%、13.8% 和 12.1%。这一方面，正如前述，是夫权(是父权的自然扩大。凡存在父权的地方，同时必定存在夫权，反之亦然)发达的反映，另一方面，也说明单偶婚制在社会中已普遍地牢固起来，并取得统治地位。民族学调查与研究普遍证明，父系家族是父权制时代的独立于氏族的社会、经济的基层单位。这种家族“包含三代到四代同为一位父亲的后嗣的近亲，也包含这些人的妻和子女，有时更包含女婿以及其他被收入家族中来的亲属”¹⁾，即是由若干对过着单偶婚制(有的多妻)生活的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亲属集体，有时这些单偶婚制的夫妻及其子女是拥有小份经济的相对独立的，甚至可堪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生活单位。南墓地的墓组往往由两个墓葬组成。含墓葬数量这样少的墓组，很可能是当时盛行的单偶婚制下的夫妻异穴合葬墓²⁾，有的也可能是父子异穴合葬墓。如果这一推定还近情理的话，那么南墓地的墓排、北墓地的墓组和皇娘娘台

1)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144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

2) 未经有意选择的进行的人骨性别、年龄鉴定的结果，似乎证实了这一推断。M10、M19 两座墓葬在三排的中部，两墓中间是 M20；M13、M11 在五排，也位于该排的中部。这两墓中间夹着 M12。在整个南墓地中，最邻近而又偶然获得鉴定结果的只有这两对四座墓葬。前一对是年龄相近的成年男性，后一对恰巧是成年女性。假设这里都是夫妻异穴合葬墓，那么，凡位于墓排中部任何中间隔着一墓的两座墓葬，性别必定是同属男性，或同属女性。所以，上述未经选择的鉴定结果，或许反映了这里夫妻异穴合葬墓较多的情况。

的墓块,便是家族的墓区,而这三处墓地则是氏族的墓地了。

氏族墓地被分割为家族墓地,正是氏族联系虽还存在,但已被分解成若干已是社会、经济单位的家族的反映;而南墓地墓排中出现的墓组,似乎是那些仍孕育在家族母体中的单偶婚制单位,即将发育成熟,试图冲出母胎的一种顽强的表现。如果,把这一认识对照本文齐家文化分期观察的话,便可看到在 4 至 7 段的年代¹⁾,父权制家族还是一看不出任何裂缝的整体,那么,到 8 段则出现了一股试图突破它的统治的力量。

北墓地的情况,还使我们可能对当时的家族再讲几句话:(1)据前述,可认为这里的氏族分为四个家族;(2)遗留第四墓组的家族墓区,墓葬数量过少,且无 III 段墓葬,和一至三墓组比较,可知它不是一完整的家族墓区;(3)一至三家族墓区的墓葬及葬人的数量分别为九座(12 人)、八座²⁾(11 人)和十座(10 人),这约略相近的情况指明,这三个家族的人口数量基本相同。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于相同的时间内,只有人口数量接近,死亡的人数才能相近;(4)一、二两墓区各自在同一段别内,均只有一座夫妻合葬墓。这说明家族在同一年代内,只有一人才享有妻子殉葬的权利。这些能对妻子实行这种形式夫权的人,可能是其家族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同时拥有父权的家长。

(三) 产业结构及社会分工

前面所讨论的材料,基本上属于本文齐家文化分期的二期和三期七、八段。为了使我们的认识放在和上述一致的年代范围内,这里讨论的基本上也应只限于上述年代界限内的材料。由于秦魏家遗址存在 HI 为代表的非齐家文化遗存,在未搞清楚这里发表的大多数遗存的年代之前,自然不宜使用秦魏家遗址的资料。为了使某些问题的历史线索搞得清楚一点,这里考察的范围也将扩大到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基本上可能达到一期三段的资料。

齐家文化墓葬随葬的生产工具不多,除骨针、骨锥外,基本上属农业工具及手工工具制品。农业工具有石斧、石铲、骨铲、石锄及石刀、石镰。其中石锄(秦 M15:1)的形制,基本上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同类制品相同。齐家文化的房址、灰坑及墓葬中,都发现过粟,以及 30% 左右的墓葬使用猪下颚骨随葬的现象,反映了种植谷子的旱地农业,仍然是这时期的主要经济部门。

马、牛、羊及驴已成饲养对象。按大何庄出土兽骨的统计,羊骨占 21.06%。秦魏家猪、羊及牛的下颚骨共发现五一八块,其中羊、牛的下颚骨分别占 9.7% 及 7%。可见,在饲养业中,羊、牛成了次于猪的主要饲养对象。大何庄出土的羊下颚骨,在猪、羊、牛下颚骨总数的比例,高于秦魏家,达到 21.87%,同时,这里的墓葬出现用羊下颚骨代替猪下颚骨随葬的情形,或许反映了在八段以羊为主的畜牧业,较前有进一步的发展。

1) 5、6 两段虽缺乏材料,但这两段的年代,在 4、7 段之间,可估计它们的情况,当不会有什么区别。

2) M138 左、右均为 III 段墓葬,据同一墓区的墓葬按年代排列的情况来看, M138 当属 III 段。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下)

在产业结构方面,除畜牧业比重日益增大这一特点外,制铜业是一引起人们注意的生产部门。

凡是经大规模发掘的一期三段以后的遗址及墓地中,都发现有铜制品。皇娘娘台、秦魏家及大何庄分别见到铜制品三十件、七件和二件,此外,在广河齐家坪¹⁾及贵南尕马台²⁾的墓葬中,也都随葬铜镜(齐 M41、尕 M25)、铜斧及铜指环和铜泡。前三地铜制品的种类有凿、钻头、刀、锥、斧、环、匕及条形铜器和饰品。这些情况说明,齐家文化的制铜业,已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分布地点广泛,种类及数量又相当多的齐家文化铜制品,有的经鉴定证明是纯铜的,有的被确定为青铜的。这引起学术界关于齐家文化时代属性,即是纯铜时代抑或青铜时代的讨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有的学者不是首先把对象的年代确定下来,而是按纯铜→青铜的一般规律,去推定对象,乃至对象所属的考古文化的年代,以致产生了要把齐家文化的年代下限拉到接近妇好墓时期的说法³⁾。唯物辩证法认为,时间是表征物质过程的持续性和连贯性,反映着物质运动的客观联系的物质存在形式,任何物质的东西都存在于时间中,时间是任何发展的根本条件。为了使齐家文化的铜制品及其有关问题,得到比较客观的认识,这里据本文提出的齐家文化分期,对它们作些检讨。现将齐家文化铜器分析结果统计成表十。

表十 齐家文化铜器分析结果统计表⁴⁾

器 名	器 号	出土地点	分析方法	材 料
铜刀	AT5:249	皇娘娘台	定量分析	红铜
铜锥	T13:1	皇娘娘台	定量分析	红铜
铜锥	19948	皇娘娘台	激光光谱分析	红铜
铜锥	2281	皇娘娘台	激光光谱分析	红铜
铜斧	H72:1	秦魏家	金相鉴定、光谱定性分析	红铜
铜环	M99:6	秦魏家	定量分析	铅青铜
铜锥	T6:2	秦魏家	金相鉴定、光谱定性分析	青铜(锡、铅)
铜尖	KG ₃ 730(2):27	秦魏家	光谱定性分析	青铜(锡、铅)
铜镜	M41	齐家坪	元素分析	青铜(锡)
铜斧		齐家坪	元素分析	红铜
铜镜	M25	尕马台	定量分析	青铜(锡10%)
残铜片	T30:27	大何庄	定量分析	红铜

皇娘娘台两次《报告》均认为该地发现的三十件铜器的材料,都是红铜。表中所列经过鉴定的四件铜器,也都是红铜。可以肯定,皇娘娘台是不出青铜的。该地的铜器,绝大多数出于遗址,只有一件出自 M24。出铜制品的那些遗址的单位,虽不能确定它们在齐家文化分期表

1)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3期。

2)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

3)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3期。

4) 同1)。

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2 期

中的年代位置,但从“墓葬都打破了深灰土”,这在一至三次发掘所确定的该地齐家文化最晚地层的情况,以及从第四次发掘公布的平面图中的灰坑、房址多被墓葬打破的事实来看,或可认为皇娘娘台的大部分铜制品的年代,能早到齐家文化一期 3 段。同时,从此地四次发掘均未见二期 5 段材料的情形来看,至少可肯定这里出土的铜器的年代,也不会晚到二期 5 段。

秦魏家出土的七件铜制品,经过鉴定的有四件。其中 KG₃ 730②:27 那件铜尖,未见于《报告》。M99:6 那件铅青铜环,根据 M99 被定在秦魏家分段的 VI 段来看,年代可晚到齐家文化三期 8 段。KG₃ 730②:27 青铜尖出自 2 层。这里 2 层被“2 层”墓葬打破,压在打破三层的“3 层”墓葬的上面。故可推定 KG₃ 730②:27 青铜尖的年代,当早不到齐家文化二期 5 段。据此,可肯定这里的两件青铜器的年代均晚于皇娘娘台。

在分期与源流一节中已指出,解放前齐家坪出土的大部分陶器的年代,和《秦魏家诸遗存的年代关系》中的三段相当,也就是被定在齐家文化分期的三期 7 段。估计上表中两件出自齐家坪的铜器的年代,也不会与此相去甚远。

根据大何庄出土材料的年代不早于三期 6 段来看,该地 T30:27 残红铜片的年代,也当早不过三期 6 段。

茆马台出青铜镜的 M25,未发表陶器资料,难以推定它在齐家文化分期的年代位置。

从上面的叙述中,似乎可清晰地见到齐家文化制铜业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属齐家文化 3、4 段的皇娘娘台发现的那么多铜制品中无一件青铜器的事实,当不是偶然的现象,是当时制铜技术水平所达到的程度的客观表述。这时期铜器数量多,品种不少,不仅存在着冷锻技术,而且也存在单范,甚至合范铸造技术¹⁾,当早已脱离早期金石并用时代,而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阶段。齐家文化三期 7、8 段的几件青铜器,当是制铜技术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由于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红铜制品²⁾,和有时仍采用冷锻技术³⁾制作青铜器,故即使把这时期归入青铜时代,也只能是这时代的伊始阶段。

如果这一认识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孕育出来的许多不同谱系的考古文化中,还只有齐家文化可能被认为是独立地走过了纯铜→青铜这一基本完整的制铜技术的过程。制铜技术是齐家文化生产力高涨的强有力的因素之一,同时,它本身也是生产力高涨的标志。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能出现齐家文化这样规模的制铜业。从采矿、冶炼、制模到熔铸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要求并锻炼出熟练的劳动者。在存在家族的情况下,制铜业可能成为某些家族的世袭专业。

秦魏家 M5、35 分别随葬陶垫和陶拍的情况,向我们提供了当时存在着专门的制陶劳动

1)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 年 3 期 279 页。

2) 能确定属于这一阶段,并经鉴定证明是红铜制品的数量极少。但从齐家坪出土的铜斧仍属红铜来看,估计这时期的红铜制品一定不少。

3) 同 1)。

者的信息。如果说制陶这一传统的手工业已存在着专门的劳动者的话,那么,不言而喻,技术远较之复杂的制铜业自当已有了专门的匠人。不过,血缘纽带的联系,以及与之适应的原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手工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脱离农业的地步。

大何庄遗址揭示的五处“石圆圈”遗迹,显然是宗教性质的遗存。这些“石圆圈”的旁边,一般都有卜骨或牛、羊的骨架, F1 的东边遗有被砍了头的母牛骨架,腹内还遗有小牛的骨骼, F3 的南边发现了两块卜骨,显示出当时牲祭、占卜的情景,早已存在的占卜巫术¹⁾这种宗教形式,到现在已具有相当复杂的仪式。皇娘娘台 M8 的墓主人使用羊卜骨随葬,秦魏家 M23 随葬的羊卜骨,被仔细地放在一只可从腹部扣合的高领双耳罐内。自然,随葬的羊卜骨是墓主人生前巫师身份的标志。在贝加尔湖沿岸古代墓葬的发掘中,也发现过被认为是萨满教的巫师的墓葬²⁾。齐家文化出现的巫师墓葬,可以认为是当时已存在着巫师阶层的例证。

可见,畜牧业和制铜业的发展,是齐家文化父权制极端重要的基础。在以畜牧业及制铜业为标志的生产力总的发展的根基上,萌发出来的社会分工,包括存在一个巫师阶层,是父权制总的社会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份。

1) 桥村 H4 发现的羊肩胛卜骨,是我国目前发现卜骨中最早的。桥村的发现,推早了占卜术出现的年代。见《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 3 期。

2)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Неолит и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Прибайкаль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5г.

ON THE QIJIA CULTURE

by

Zhang Zhongpei

According to stratigraphical evidence and typological analysis, the remains of the Qijia culture discovered at Huangniangniangtai of Wuwei County, Gansu Province, at Dahezhuang and Qinweijia of Yongjing County, Gansu Province, and at other places in Gansu, Qinghai and Ningxia ar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of eight stages. The C-14 data from F7 at Dahezhuang reveal that the last three stages lie in the age of the Xia Dynasty.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ottery shapes of the Qijia culture and those of the Keshengzhuang II culture shows that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s of the first period of the former basically coincide with the latter, and that close relations exist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Complexes of the Qijia culture from the third stage of the first period onward are later than the Keshengzhuang II culture.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first period of the Qijia culture is later than the Banshan-Machang culture by stratigraphy, and the former culture is not an outgrowth of the latter on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a comparison of their pottery objects. The complex discovered at Xinglongzhen and Xiaqijia in Xiji County, Ningxia, is earlier than that represented by H1 at Qinweijia, and the latter is earlier than the Qijia culture. So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Qijia culture might have been developed from the Xinglongzhen-Xiaqijia complex.

A study of the tombs of joint burial and cemeteries of the Qijia culture shows that from the fourth stage in the second period, it was developing in the stage of patriarchy and the society consisted of households and clans. In the eighth stage, the cohesion of the family in the household, or of the monogamous unit, was stronger than before and its influence increased to be felt. As a result, the household began to split up. There was then a social stratum of wizards. Animal husbandry and copper metallurgy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ety. The metal objects produced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stages are entirely copper, but the seventh and eighth stages saw the appearance of bronze. There was a period in the culture when only copper was known, and this gives a clue to researching Chalcolithic complexes in China.